

1705

36

# 荆門文史資料

第五輯

8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荊門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989年10月

**主 编：**刘声玉

**副 主 编：**杨禹九 李英杰

**责任编辑：**陈广珍

**编 辑：**陈棠生 石顺锦 古学勤

**责任校对：**古学勤

## 目 录

抗日时期在荆南的战斗	杨震东	( 1 )
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荆门支援解放大军南下活动片断	彭振华	( 26 )
汉江干堤沙洋何家嘴堤段的 溃口与复修	祝新民 李仲宏	( 29 )
廖学道木马岭遇难	黄氏伟 李少白	( 35 )
解放战争时期拾回桥青年的进步活动	黄 彬	( 40 )
解放前夕在长湖的革命活动	张宝鼎	( 48 )
靳家湖农民暴动	陈 荣	( 56 )
高家畈农民暴动	周立言	( 59 )
邓家湖农民暴动	谢 威	( 63 )
草场农民暴动	汪德平	( 70 )
略记天星寨尖山寨的农民革命运动	陈寿年	( 75 )
中共荆门党组织创始人 ——胡孟平	李英杰 孙昌炎	( 82 )
常正刚烈士生平	常伯驹	( 88 )
土地革命时期部分英烈简介	陈广征	( 98 )
土地革命时期荆门烈士名录		( 101 )

万人杰传略	陈广征	(104)
万人杰先生在城北办教育点滴回忆	张才	(108)
回忆万人杰校长	彭兴中	(111)
私立文学中学和万人杰校长	周学根	(115)
舅父万人杰在荆门办教育的概况	张世荃	(119)
我随父亲逃离日军虎口	万显静	(122)
和父亲相处的日子	万 玮	(124)
周益三传略		(127)
怀念周益三先生	帅旭东等	(130)
慈父严师	周先心	(136)
缅怀先师刘楚善先生	丁德爽	(140)
记李松琳先生	谈 瀛	(149)
罗贡华先生当年二三事	段继李	(160)
荆门的民族概况	严世华	(163)
荆门的五大宗教简介	杨学枝 严世华	(170)
沙洋回族及伊斯兰教	刘 岳	(185)
持松法师	万松亭	(188)
尘空法师小传	周天裕	(194)
明真法师印象	周天裕	(201)
荆门佛教道教寺观概况	杨学枝	(209)
关于《钟廷生遇难始末》一文的订正		(223)

## 抗日时期在荆南的战斗

杨震东

1942年4月，蒋介石在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又悍然下令第五战区限期消灭新四军第五师，进一步掀起反共高潮。驻守在荆门、南漳前线抗日的第三十三集团军奉命从一八〇师中抽1个团，配合钟祥的反共武装曾宪成的第三游击纵队向我北山根据地进犯；又从七十九师抽1个团兵力，从东巩、栗溪直插脚东港，进攻我荆当地区；同时，荆门的姚金陵第三游击队与之配合，窜到城南，向荆南根据地进犯。在宜昌外围的国民党五十五师也抽出一个团，配合郑家良游击队，经河溶南面，插到彭家场，向我荆南的王家草场、张家场进犯，总兵力达万人以上。一时气势汹汹，扬言要在3个月内消灭襄西我军。我鄂豫边区党委为了顾全大局，有利对日作战，决定将十五旅部分县武装及襄西党政机关，暂时转移襄东；在襄西地区留下少数组干部和少量武装，成立荆当、荆南、北山3个坚持委员会，继续在原地依靠群众，坚持小规模游击战，同敌、伪、顽周旋。

襄西主力转移后，国民党的土顽部队进入我抗日根据地，抢夏粮，拉耕牛，设立基层乡、保、甲反动政权，搜捕和杀害我分散隐蔽的工作人员与群众抗日积极分子；不法地主及坏分子也趁机反攻倒算，欺凌群众，根据地遭到很大破坏。北山地区原来群众基础较好，虽遭敌人破坏，坚持工作却做得不错。荆当、荆南两处工作就差些。特别是一贯坚持反共的姚金陵和他的部属丁楚

善、陈楚斌、陈楚武等人，都是荆南地主阶级新的代表人物，同当地反动势力有密切联系；他的支队窜踞荆南后，更是作恶多端，气焰十分嚣张，成为荆南坚持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障碍。再加之荆南坚委缺少军事指挥干部，工作极为艰苦，活动地带已由原来的路西、路东两区逐渐缩小到只有斯家湖、任家咀子一个半保的范围，情况十分严重。

襄西地委转移河东，改组成京钟荆当地委。根据当时襄西情况，边区党委和五师首长同意，派地委宣传部长李方震（即刘真）同志率领四十五团的第三连渡河检查和部署坚持工作。为加强襄西坚持力量，派叶云同志返回北山；另外调我和童勋伯、郭础、陈济平等同志回荆当、荆南参加敌后坚持工作。当时我任四十三团教导员，童勋伯在四十五团任营长。李部长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坚决服从，赴汤蹈火也要同坚委的同志在一起，把敌后斗争坚持到底。从此我就开始了一年多的荆南敌后坚持斗争生活，直到我军恢复襄西抗日根据地。

## 一、段家榨屋巧歼顽敌

1942年6月中旬，李方震部长率领第三连全体指战员和我们参加襄西坚持的干部从钟祥水湖间一字街渡口，深夜顺利渡过襄河，经瓦瓷滩、烧钱庙，直插雷李新集以西，到达横店子附近的段家榨屋北边，在一个叫孙家湾子的小村里宿营。天色微明，化了装的哨兵走出村，发现三四百米远的高地上隐约有岗哨活动。经隐蔽接近侦察，发现是穿黄色军服的国民党军，当即向李部长报告，并密切监视敌人。当时我们还未摸清敌情，李部长就找村里的群众了解，得知是昨天才到的一股国民党县保安大队，估计不足两百人。他们还不知道我们部队已经到来。群众对国民党兵的骚扰深为痛恨，要求我们去消灭它。我们决定奇袭这支顽

军，打响渡河后的第一仗，以打击敌人的反共气焰。先让部队休息，待饱餐之后行动，并部署由童勋伯同志带两个排从正面攻击，我带一个排包抄敌后，务求全歼。午饭后，战斗打响，童勋伯同志率部冲入敌阵，敌人毫无戒备，一时枪声四起，杀声连天，一下子就消灭敌人一个中队，打死打伤敌人十多人，俘虏三十多人，缴枪三十多支，弹药一万多发。我率一个排在敌侧面阻击，正乘胜追击，发现敌后续部队数百人接应上来。再找俘虏一问，才知道是姚金陵的整个支队共一千多人，恰好流窜到这里。开始消灭的只是他的前卫部队。我们趁敌慌乱，迅速将部队撤下来，因童勋伯同志负伤，由李部长率领部队和伤员、俘虏带着战利品向北转移；我带一个排向西杀出去。姚金陵摸不清我军实力，他的部队又吃了亏，不敢贸然追赶，只好收拢队伍，转移驻地。

这一仗虽然战果不算大，政治影响却非同小可。群众奔走相告，河东的新四军又回来了。敌、伪、顽十分紧张，纷纷加强戒备，四出侦察我军行动和实力，一些反动爪牙大大收敛了他们的气焰。姚金陵更为沮丧。他奉命在荆南“清剿”已有三个多月，没有找到我一兵一卒，这一下子竟然丢失一个中队，简直出乎意料。姚金陵怀疑是叛徒刘震（原荆南财政工作人员）告的密，就将他活埋了；事后弄清我们只是一支一百多人的连队的时候，不禁恼羞成怒，信誓旦旦要出这口气。他布置所属3个大队和所属乡保武装四出搜查，所到之处，人畜不安。这个由国民党军校培植出来的反动鹰犬，始终不明白他们已越来越深地陷入群众的怒海中，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灭亡。

## 二、坚委讨论斗争决策

我带部队脱离战斗后，就前往荆当，再折回荆南，与李纯斋

同志联系上，恰好王展同志也过襄河来了，正和纯斋同志在一起。李部长带部队到了北山，对那里工作检查部署，再南下荆南，与我会合。由于当时没找到纯斋同志，就留下我和王展两人，叫我们把情况告诉纯斋同志，他又带部队到荆当地区去了。我们找到纯斋同志的第三天，李部长从荆当回来，在荆南路西九口堰会合。纯斋同志汇报了荆南坚持情况，部队立即转移到任家咀子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除纯斋、王展同志和我，还有孟顺德、刘光玉、李忠毓等人。李部长介绍了北山、荆当两地坚持工作的情况，同大家分析荆南斗争形势和斗争策略，一致认为：困难只是暂时的。敌、伪、顽目前貌似强大，但他们与人民为敌，必不能持久。姚金陵虽然在荆南有反动的社会基础，但他倒行逆施，危害群众，为群众所痛恨，同样不会有好下场。而且荆南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苏区，又是经过两年多重新创建的抗日根据地，我们在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目前虽然遭到敌、伪、顽的破坏，但群众向着我们。正所谓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何况原有的群众组织只是暂时隐蔽，积极分子也只是暂时分散，都可以重新组织起来活动；加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统战关系很多还在保持联系等等，这都是有利条件。因而，我们的斗争并不孤立，只要我们敢于斗争，坚持斗争，充分运用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讲究斗争策略，把保护群众利益、保卫人民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就能站得住脚，打开局面，无往不胜。大家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必胜信念。随之讨论了斗争方法，决定要在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还要把统战、对敌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一）原有的统战关系，如老山洼舒厚甫、李协昆，蔡庙以南的王伯膏、周璇庭等关系，要继续加强。对襄沙公路沿线的敌伪维持会仍要保持原有关系；（二）加强对敌伪的爱国抗日教育，分化瓦解敌人，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把打击力量集中到最顽固、最反动的敌人身上。（三）对于敌武装部队，我

们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就虚，尽量避免接触。对其零星小股和乡保武装，能吃掉的就吃掉。力争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绝不硬拼死打，消耗自己的力量。

李部长布置完工作，又分工。纯斋同志为坚委书记，王展同志负责宣传、统战工作，我负责军事，其余的同志各有职责。给我留下一个班（有两支手枪，5支撒把枪），再加上原有的枪枝和伤愈归队同志的枪枝，实力将近有一个排，足以同敌人周旋，坚持斗争。

会议刚结束，官家凹子地下情报站的靳照伍同志送来紧急情报，说杨家集的日军探知我部在任家咀子，就会同五里铺的伪军大队长曾哲廷、副大队长靳殿林各带一个中队分两路向任家咀子包抄过来。我们立即带领部队向赵家集以东的刘家巷转移。日伪军在任家咀子扑了空，一无所获，就把群众的鸡鸭猪牛抢劫一空而去。

### 三、夺回耕牛 打好坚持第一仗

李部长回河东以后，我们这支小部队就在坚委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到处宣传发动群众，加强统战工作和对敌伪的工作。基本群众到处为我们宣传：“新四军又回来了！”姚金陵是国民党在荆南“清剿”的头目，他的支队是主力，“清剿”了几个月没有成效，还挨了我们一顿揍，现在我们又在他的“清剿”区内来去自如地活动，他当然无法忍受，派兵四处追踪，恨不得把我们这支小部队吃掉，至少也要把我们赶出去。可是，折腾了一个多月，只是徒劳，连我们的影子也没有看到。他也知道是群众掩护了我们，于是生出一条毒计，凡是住过的村庄，他就派兵去那里搜查，对群众捆绑吊打，抢劫财物，企图迫使群众不再接近我们。一些乡保人员，也趁机压榨群众。但是，他们这样做适得其

反，人民对我们更亲，对他们更加仇恨了。

枣树店的李端甫，原来同我们有过联系。我们的主力部队撤离后，他就投靠了姚金陵，当了国民党丁枣乡的乡长，此时也同我们作对，伙同姚部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丁楚善，派兵到我们经常去的地方，一夜之间抢了东刘湾、西刘湾、任家咀子3个村庄的35头耕牛，还强迫召开群众大会，扬言谁家再进驻了新四军，不报者就拉谁家的耕牛。这对群众是个不小的威胁。当时耕牛是农民贵重的生产资料，没有耕牛，就种不成田，收不到粮食吃不上饭。这3个村的基层党员和青年群众赶到刘家巷子找纯斋同志，要求参军打姚金陵，群情激愤，誓与姚金陵不共戴天。

坚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认为一定要保护群众利益，否则就不是代表群众利益的新四军和共产党，必须设法夺回耕牛。这是我们回到荆南后的第一仗，定要打好。大家深感责任重大。

派出去侦察的刘光盛、刘光银、靳邦玉等同志先后汇报了搜集到的情况。原来抢牛是李端甫为了给儿子娶亲、花钱想出来的坏点子。随后侦察队长王永吉同志也回来了，他侦察出李端甫为儿子选择的婚期是八月十五日过客，十六日迎亲，十七日谢客结束婚礼。王永吉同志是贫农出身，家里很苦，从小没读一天书，不识一个大字。但他对党忠诚，作战勇敢，斗争经验丰富，而且天资聪明，有很多好主意。他建议在李端甫的儿子的婚期，把新娘弄来作为人质，逼还耕牛。他说，我们若来“文”的，托人去劝说他还牛是不可能的，他们危害人民成性，到口的肥肉怎肯吐出？若来“武”的，去打，那么多耕牛，他们一定不会藏在一处。即令把他们打垮，也不见得会把耕牛全部夺回，不如来个“武装请客”，把他的儿子媳妇“请”来，迫使他拿牛换人。他只有这个独生宝贝儿子，不会不要儿子的。他还说，已经探明李家婚期不会增加兵力，因为丁楚善说过：“乡公所有十多条枪，

是足以对付这里的零星共军的。这一建议，大家都说很好。经过反复调查得知李端甫请的厨师和吹鼓手当中，有两个人是原农救会的成员，经周密筹划，我们就把任务和行动计划向他们交底，要他们暗中配合。厨房是个便于接头，又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容易打听情况，就成了我们派人化装进出的联络点。又派钟怀清指导员化装成送礼的客人进去，查明乡公所的人员情况，发现除经常在室内、室外各有一个武装人员值勤以外，其余的人都不带枪，武器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摸清情况，决定在拜堂时动手。由王永吉同志带一个侦察小组对付李端甫和堂屋里的众宾客；副队长罗永炎带一个侦察小组负责劫走李的儿子和儿媳。王展同志带领一个步枪班，从庄前小溪涉水过去，埋伏在稻场边，钟指导员再带一个侦察组配合，负责监视和解决乡公所的武装。我带两个步枪班隐蔽在附近小坡地，控制全面，并作掩护，约定完成任务后就按指定地点转移，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则各自分散转移到路西九口堰会合。部署就绪，分别行动。

8月16日那天天阴，既无星星也没有月亮，是我们行动的好时机。花轿进门，满屋子灯火辉煌，喜气洋洋，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吹鼓手奏起了喜庆曲调，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乡公所的武装人员，除了内外值勤的两人，其余的人都在打牌、饮酒、消遣作乐。拜堂开始，新郎新娘走出房门，李端甫端端正正坐在堂上，等待接受新婚夫妇的叩拜，唢呐声突然改成《小放牛》的曲调，这是预先约定的行动讯号，埋伏在稻场边的步枪班战士一跃而起，缴了两个值勤乡丁的武器，控制了屋外的局面。在堂屋内，打扮成贺客的王队长掏出手枪，对着李端甫喝了一声：“不要动！”两个侦察员就上前缴了李身上的手枪，满堂宾客目瞪口呆。钟指导员迅速堵住挂枪支的房门，其他侦察员进去摘下全部枪支；正在打牌、饮酒的乡丁全部就擒。罗副队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早已把李端甫的儿子和儿媳带到老远老远。一切都在瞬间顺利

地完成了。这时，王队长才开口训道：“李端甫，你放老实点。今天登门拜访，请你的儿子媳妇去作客，都是因为你抢了老百姓的耕牛才来的。只要你如数归还耕牛，我们保你儿子、儿媳的安全，否则后果由你自负。今天我们不伤害你，就是留你积极归还耕牛，不然，你的性命也逃不脱人民的掌心！还不还牛，你要当着众乡亲们的面讲清楚。”李端甫面如死灰，浑身发抖，连连点头哈腰地回答：“一定归还，一定归还……”王展同志早已进屋，向满堂客人讲道：“乡亲们，大家受惊了。我们是襄东过来的新四军，今晚来会李端甫，是请他归还群众的耕牛。我们共产党、新四军，是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大家都是种田人，都懂得没有耕牛种不成田的道理。今天李乡长当着大家的面，答应归还乡亲们的耕牛，今后就看他的行动了。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他还牛，就放人，绝对不会亏待他的儿子、儿媳。共产党、新四军从来是说话算数的。”就这样，我们胜利地返回了预定地点。

李端甫这次在众乡亲面前亏了理，儿子媳妇又被拉走，急得团团转，央求他的族人，同我们有来往的民主人士李立亭先生出面斡旋，达成了在枣树店子街上分两批交换人、牛的协议。第一批，归还20头牛，放回他的儿媳；第二批还15头，放回他的儿子。这样，五天之内，耕牛归还群众，一头不少。群众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对我们更加支持和拥护了。

这个小小胜利，对各方面都产生不小的震动和影响。姚金陵的千人大军，败在其军一小部武装力量手上，真是丢尽脸。不过姚金陵并不傻，他知道如果没有乡保人员为他们筹粮派款，他的军队就呆不下去。这次如果不还牛，李乡长的儿子媳妇真的丢了命，其余的乡保人员都会寒心。从长远来说，对他不利，“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李端甫受到打击，心有余悸。他的儿子、媳妇在我们这里受到优待，又学到一些抗日救国

的道理，很受感动。回到家中，对李端甫也晓以大义，产生了一定影响。连周围的国民党乡保人员以及公路沿线的日伪维持会，也觉得我们对这件事处理得合情合理，基本群众对我们更是欢迎。我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主动接近我们，给我们传送消息，掩护我们行动。我们就像鱼儿游进大海，再不是初回襄西时那样困难了。

通过这次斗争，我们也总结了经验教训。对反动分子，必须针锋相对，你打他一下，他就老实一点。我们同千人的“清剿”大军相比，当然是劣势。但是我们部队小，灵活机动，又有群众支持，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敢于发挥优势，又讲究斗争艺术，就能把敌我优劣对比的形势翻过来，取得胜利。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军事活动家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确可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 四、打掉敌人耳目 打开坚持局面

打击危害人民最为恶劣的汉奸、特务，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襄西主力部队撤离以后，一些民族败类、地痞劣绅和一些社会渣滓，投靠日、伪，充当汉奸、特务，鱼肉乡人，群众极为痛恨。这些人又是敌人耳目，专门刺探我军情。如何打掉敌人耳目，是我们开展坚持工作局面的重要一环。

舒士怀当过国民党军官，李西常是靠反共起家的小士绅，现在他们做了投靠三方的汉奸、特务。分别是国民党第五战区别动队的少校组长和副组长，又是五里铺日军的便衣密探。手下十多人，一色短枪。他和那些伪军头目称兄道弟，与姚金陵相勾结，经常领日伪军到杨家集、靳家湖一带“清乡”、“打捞”，抓人抢粮、宰鸡杀鸭、赶女人、烧房子，无恶不作，两人是死心踏地

的铁杆汉奸，群众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坚委早已决定严惩这一小撮民族败类。

一天，侦察队副队长罗永炎同志获悉舒士怀正为他母亲庆寿，李西常等一帮特务、汉奸都在他家赌钱作乐，全无戒备。我们就派钟指导员带一个侦察班，同罗副队长一道去执行惩办舒、李的任务。当天深夜，侦察队员混进他们的赌场。舒士怀正在打麻将，另外还有一些人围在一起赌“单双”。我们的人进去后就各自盯好对象。罗副队长突然喊了声“不要动”，十多支手枪同时开火，一下子倒下了八个，灯也打熄了。我们把手电筒一照，这帮特务、汉奸一个也没跑脱，只是有两个没打中要害，还需补枪。这样一下子就打掉敌人一个“别动组”，当场缴获五支手枪，为人民除了祸害，也去掉了日伪的耳目。从此，远乡近舍安静得多了，日伪军也不敢轻易下乡“打捞”了。

打掉了舒、李，震慑了一大帮汉奸、伪方人员。他们心惊肉跳，害怕哪一天枪弹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于是有的人就主动找人向我们疏通，说他们当汉奸“为形势所迫，实际上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有的向群众赔情，表示不再做坏事，他们的凶焰大为收敛。姚金陵这段时间也心神不定，时而分兵“清剿”，时而集中“追捕”，一会儿“远距离奔袭”，一会儿“及时转移”，飘忽不定，不敢在比较固定的驻地落脚；抢钱、抢粮、抓人、罚款等行径也不敢为所欲为。

## 五、粉碎顽军投敌的阴谋

1942年秋，姚金陵在荆南“清剿”已经到了计穷力拙，进退两难，不好向其主子交账的地步，突然生出一条“妙计”，派一个连，到杨家集投降日寇，进入据点，充当伪军，对我军实行“联合清剿”。这条诡计得到他的上司同意，正在同荆门日军秘

密洽谈。我们从靳照伍同志的父亲靳邦然（我们指派到五里铺的日伪保长）那里得到这一可靠情报，认为不能等闲看待，立即向纯斋同志作了汇报，决定粉碎这一日顽勾结的罪恶阴谋。

我们认真分析了日顽之间的矛盾，认为他们在对付我军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之间，由于各自利益所在，故此时而相互勾结，时而兵戎相见。日军在杨家集只有一个大队的兵力，姚部若来一个连，就形成“客大欺主”之势，这是日军所不愿的。他们不能不提防姚金陵在使“特洛伊木马计”。对于杨家集的维持会会长杨维臣来说，顾虑就更大。增加一个连，不仅增加了他的负担，更怕被取而代之。何况姚金陵同他关系不好。姚多次在群众中骂杨维臣是汉奸，还说他“通共”。因此，杨维臣怕危及自己的生命，这就为我们粉碎姚金陵的阴谋提供一个突破口。

我们通过地下关系，把杨维臣拉出据点，由纯斋同志亲自同他谈话，晓以大义，陈以利害。杨维臣出于对自身的考虑，完全接受我们的意见，答应从中阻挠，并告诉我们，他马上要到县城参加日军司令部的会议，约定由我们及时通告情报。他到了县城，日军宪兵司令果然在会后征求他的看法。他直接了当地表示杨家集维持会承受不了再加一个连兵力的负担，同时抓住日军的顾虑，说是“皇军人少，姚部人多，恐怕姚别有用心”。这番话正搔中痒处，日宪兵司令笑呵呵地称赞杨维臣“大大的好”。于是通知杨家集日军，姚部这个连，只谈判改编，可以进荆门县城，但不能进入杨集据点。

杨维臣回来，及时把情报送给我们。当我们得知姚部将要派代表到杨家集同日军谈判，并且还把一连人带到据点附近，打算谈判成功就驻进杨家集，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谈判那天的中午，姚部代表四人从岳飞城出发，进入杨家集日军据点，同时还带有一连准备投降的部队，在杨集附近的杨家

湾、大园湾一带待命。我们也派了钟指挥员和王队长，带了8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隐蔽在据点外的树林里，观察动静，伺机行动。

姚部代表进入据点，杨维臣就派人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这是预先约定的讯号。我们估计他们的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就从树林里出来，首先向日军据点岗楼上的哨兵“叭、叭”打两枪，转身又向姚部驻地的湾子里打两枪，再向据点扫射一阵，然后抽身撤走。据点的日军，对姚部早有戒备，受此袭击，立即将机枪、步枪齐向姚部驻地开火，打得姚部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一面组织还击，一面拼命逃跑，一口气跑到白石坡才收住脚。姚部强拉的新兵较多，已经趁机弃枪逃走一半。

据点内的谈判桌上，日顽双方代表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愕了，刷的一下子都站了起来。日哨兵进来报告受到东北方向不明部队袭击。日军头目马上变了脸，指着姚部代表大骂，立即把他们捆起来。

姚金陵又一次失算。投降诡计破产，跑掉了半个连，还被日军扣押四名代表，只好派他的亲信副官来找杨维臣，要求疏通关系，放回谈判代表。杨维臣这时也神气起来，挖苦姚的副官说：“我杨维臣是汉奸，又通共，而你们这次派兵来投降日本人，算是什么呢？你们是‘剿共’部队，我是通共分子，怎样能帮你们的忙呢？”姚的副官知道是姚金陵得罪了他，赔了不少好话。其实杨维臣早就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在姚部来人央求下，再三同日军疏通，把姚的四个代表放回去。一场投降丑剧，就此收场。姚金陵再也不说杨维臣是“汉奸”了，还说他“够朋友”，我们也又多了一个可靠的“地下情报站”。从此，日军同顽军的关系逐渐紧张，顽军不敢到日军据点附近去活动；日军也不敢轻易下乡滋扰，这就更有利于我军的活动。

## 六、镇压李孟武 争取李端甫

1942年底，由于北山、荆当两地斗争形势发展的影响，加上我们不断地打击敌顽势力，荆南的斗争形势日趋好转。6月初，我们建立的基层政权只剩下一个半保，路东已经恢复了一个乡，路西恢复了近两个乡。日、伪、顽进入路东骚扰群众的情况大为减少，但路西蒋集乡伪乡长李孟武仍很猖狂，不时到我基本区骚扰。前不久，还在王家山头、宁庙子、剪子垱等地抓去我3个农救会主席和两个中年妇女。于是坚委决定，镇压李孟武，摧毁伪乡政权，巩固我已恢复的小块根据地。

李孟武是“脚踏两条船”的人物。他原是日伪的维持会长和乡长，却又接受姚金陵委派，挂上国民党乡长的头衔，为人凶险狡诈，无恶不作。他的乡公所，本在蒋家集，但他却带着十多条长短枪，还有一条“机枪”，以四岭山的李家湾为巢穴，经常出没四岭山、孟子港一带，危害乡里。

有一次，我们侦察到他在四岭山，还在罗永炎同志二叔家的湾子里住了两天。我们赶到时，他却转移了。

第二天，我们派侦察人员四处查询他的行踪。罗永炎同志带着侦察员小杨前往孟子港，在路上碰到他二叔从脚东港赶集回来。他告诉说：“在港堤上张庄碰上李孟武的哨兵盘查，把他身上的钱都搜去了。”我们知道了他们的确实驻地，就部署歼灭这股害人虫的作战计划，将侦察队的两个班分作两路：一路顺港坡笔直南下向东插，一路由四岭山以西，顺山坡越过张庄，再转向东南，对李孟武一伙形成一个张开的网。我直接指挥两个步枪班从北向南，直插张庄，力求全歼这股敌人。规定行动迅速，动作隐蔽，打响以前，尽量不让敌人发觉；万一被人发觉，就打响，其余部队则按原计划迅速猛攻围歼。